



一个山乡电影人的 42载“追光”人生

□李晓

苍翠群山下，重庆市万州区龙驹镇，秀美安宁。在两万多人口的龙驹镇，有一个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会堂，而今经升级改造，在岁月风尘中再度归来，成为万州区唯一一个乡镇惠民电影院。电影院每周放映两场居民自己挑选出来的电影，看电影成为镇上居民心心念念的文化生活。

电影院的主人叫邵荣华，在当地家喻户晓。这个扎根山乡的电影放映员，已“追光”42个春秋。

1 看坝坝电影是乡民的节日

今年62岁的邵荣华，是1979年毕业于的高中生，在当时的农村算是个文化人。

邵荣华从小喜欢看电影，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与眺望。1982年，他所在的万州区文明乡（现已并入龙驹镇）招聘电影放映员，他被录取了。与邵荣华最初搭档放电影的，是而今已年过六旬的滕如恒。

当年，邵荣华与滕如恒轮流着放映电影。两人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跋山涉水，挑抬着300多斤重的放映机、银幕、发电机，到村里放映坝坝电影，这也是一个体力活。邵荣华感叹，40多年来，在放映路上经历的惊心动魄太多了。

一个夏天的下午，邵荣华赶往一个村子放电影，途中遭遇暴雨，跨越河流跳墩时被冲进滚滚激流，他怀抱着放映机在翻卷的河水中拼命挣扎。万幸的是，他被冲到了河流中央一个巨石边，才奋力爬上了岸边。那天雨后黄昏，彩虹横跨天宇，白色银幕如期竖在了村里坝坝上，全村赶来的男女老少，在欢呼声中看完了一场电影。

还有一次，邵荣华放完电影走夜路回家，途中一脚踏空掉下山崖，幸得山腰一棵松树挂住了他的衣服，最终得以死里逃生。

村里的坝坝电影，是一代人成长的记忆，也是中国乡村的经典记忆。那些年，龙驹镇村子里的人家办红白喜事，请邵荣华来放一场电影，成为了乡亲们的一种仪式。

乡亲们的文化生活，几乎就靠电影供养着，放一场坝坝电影，如过节般喜庆热闹。邵荣华说，那时满山遍野赶来看电影的人，打着火把，像一条条在山上汇聚的火光长龙。

2 做一个幸福的电影追光人

1993年，邵荣华来到龙驹镇放映电影。镇上破旧的老会堂改造成电影院，电影院里平时灰尘积垢，雨天雨水横流，但这里仍旧是居民们热闹的聚集地。除了在镇上放电影，邵荣华还去村里放电影，一年要放200多场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乡村电影市场开始萧条。为招揽观众，无奈之中的邵荣华也放映过以武打、枪战为主的录像片，但他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，他的心思还是在电影上。

邵荣华也有过微微动摇。不少外出创业成功的老乡得知邵荣华一年放电影只能挣几千块钱，笑他“放电影放傻了”，纷纷劝他一起去做生意发财。一天晚上，邵荣华正在电影院里收拾放映器材，准备外出大干一场。镇上的老朱敲门进来，问第二天放啥电影，老朱在镇上开面馆，心里的盼头就是能看上一场喜欢的电影。邵荣华问：“老朱，假如我不放电影了，你习惯吗？”老朱急得跺脚大喊：“你不放电影去干啥啊？你一辈子就是放电影的命！”老朱的一句话，让邵荣华惊出一身冷汗。他外出挣大钱的念头，也被老朱的一句狠话给彻底挡住了。

就这样，邵荣华把根扎在龙驹山乡，坚持了下来，一干就是30多年。

邵荣华说，几天看不见放电影的那束光，心里就发慌。作为一个电影放映员，邵荣华心里流淌着自己的幸福。

在网络时代，依然有一批被电影浇灌了灵魂的人，那是电影在他们心里长满了根须。2023年春节，一个企业家从北京回来，他是看着邵荣华放的电影长大的，看坝坝电影就是植根在他灵魂里的乡愁。回来的第一天晚上，他就看了一场邵荣华放映的坝坝电影。看完电影，他一把抱住邵荣华，哽咽着表示感谢。202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邵荣华放映了一场《灿烂的她》，这场电影满足了一位老奶奶的最后愿望。病重的女奶奶说，她想在村子里的坝坝上再看一次邵师傅放的电影。一个月后，女奶奶长眠于山冈。

在当地，邵荣华的知名度很高，大人小孩都认得他。“邵师傅，有啥好看的电影

啊？”这成了大家与邵荣华的见面问候语。每逢这时，邵荣华感到心里有一股热乎乎的暖流涌动，被乡亲们认可，是他最开心的事。

3 他把家安在了电影院里

自从1993年来到龙驹镇后，邵荣华就把简陋的家安在了电影院里，30多平方米的家与电影院只有一帘之隔。在这里，夫妇俩养育了两个儿子，而今都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。在南川工作的儿子邵雁说，小时候与爸爸妈妈一起看电影，是他最美好的童年记忆。

“整个屋子里，都是电影散发出来的气味。”邵荣华的妻子曾玉梅说。曾玉梅20岁那年嫁给邵荣华后，就把命运托付给了这个电影人。现在，她是邵荣华的得力助手。

邵荣华和妻子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，一日三餐非常简朴。邵荣华说，看到老乡们看电影时的欢喜模样，比吃什么都好。最初走村串院放一场电影，得到的报酬是3角钱，后来是5角、3元、5元，如今放一场电影120元。现在夫唱妇随，一年下来放映200多场电影，除去各种开支，可挣两万多元，夫妻俩很满足。

来龙驹镇看电影的铁杆观众，也一直追了邵荣华几十年。现在放映的电影，可以在电影网上自己挑选。平时，邵荣华会拿一个小本子，在镇上做调查，征询观众们喜欢看啥电影。他还会引进一些比如防止网络诈骗、促进家庭和谐的电影来放映，潜移默化地感化着观众。

集龙驹镇电影院经理、放映员和宣传员于一身的邵荣华，每天都在电影院里醒来。晨昏之间，就是电影院里弥散开来的熟悉气息，这里就是他朝夕相处的家。现在，每周二和周四晚上，电影厅要放电影，邵荣华和曾玉梅搭档，他负责放映和设备调试，妻子则负责协助管理场地、打扫卫生。此外，夫妇俩还要去村子、社区和学校放电影，每年有200多场。

邵荣华家的柜子里，珍藏着一个个古董级别的胶片放映机。“从8.75毫米到16毫米，再到35毫米，各种胶片放映机我都用过。”邵荣华说，他会一直放电影，“直到最后一口气。”

从黑白片到彩色片，从胶片放映机到数字放映机，从漏水的瓦房影院到设施齐全的放映厅，邵荣华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凡演绎着自己的电影故事，追逐着自己的电影之光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）

乐痴刘玉珍

□谭小华

她，一辈子历经坎坷，屡遭磨难，身患残疾。然而，她硬是凭着一股百折不挠的拼劲和执着不渝的追求，凭着一份爱心和纯真，为土家山寨贫困地区儿童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旋律，创作了一首首美丽的词章，在儿童音乐创作和儿童音乐教育领域闯出了一番新天地。她就是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师范附小高级音乐教师、儿童作曲家刘玉珍。

刘玉珍，又名刘佳林，1948年4月生于湖南省邵阳市。她自幼聪颖，很有音乐天赋。11岁时，她只身前往北大荒，开过荒，种过地。由于刘玉珍能歌善舞，15岁就开始在北大荒各连队演出文艺节目。16岁时，她又被组织上安排到黑龙江省一荒原去组建小学、教书育人，从此与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由于长期与孩子们打交道，她真诚地喜欢上了孩子。于是，她立志要为孩子们写歌、谱曲、编舞，用音乐来开发儿童的智力，让孩子们在美妙的音乐中健康茁壮成长。

然而，就在地满腔热血准备将自己的青春献给边疆、献给教育时，浩劫开始了，19岁的刘玉珍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游街示众，惨遭拷打以致三级肢残。随后又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，一去就是8年。尽管环境恶劣，但刘玉珍没有放弃对音乐的酷爱与追求，她坚持自学，每天用一把小口琴练习作曲。1980年，刘玉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黑龙江省教师进修学校。1988年后，她又多次参加培训深造，并得到了著名作曲家顾震青、词作家枚川及秋里、吴玲芬等名师的指点。这些为刘玉珍今后的音乐

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990年，刘玉珍获准调入石柱师范附小任教，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北大荒生活。正当她对未来满怀憧憬时，不幸于1995年10月下班途中遭遇车祸，致使腰尾椎骨断裂、左半身瘫痪。

尽管刘玉珍屡遭不幸，但磨不掉她对音乐的酷爱与追求，仍潜心儿童音乐教育，坚持业余创作。最近10年，刘玉珍更是灵感如泉涌，创作并在全国性音乐刊物上发表了100余首歌曲，其中《春天》《我爱妈妈的笑脸》《教师的情谊》等歌曲，分别被选入《教坛百家歌曲精选》《当代教师优秀歌曲选》《中国当代优秀歌曲选》等书中；《我相信你亲爱的党》《拥有一缕阳光》《男子汉的歌》《我们都是党的好娃娃》等，分别获得全国“中音杯”“聂耳杯”优秀奖，中国首届作曲比赛三等奖和全国通俗歌词大赛创作奖。她多次荣获全国性音乐知识大赛一、二等园丁奖及辅导奖、

组织奖等。

1996年，由著名音乐家乔羽、石祥题词的《拼搏者之歌——刘玉珍歌曲选》正式出版。除谱曲作词外，刘玉珍还写了大量有价值的音乐论文，如《音乐是开发儿童右半脑智慧的金钥匙》《谈电子琴等键盘乐器的常用指法》等，被收入《中国当代优秀教育论文集》。由于在音乐创作方面成绩卓著，刘玉珍获得了“儿童作曲家”认定证书，被《野菊花》歌词学会选为副会长、《中国当代音乐界名人大典》聘为副主编。

艺海无涯，刘玉珍从不因为自己是残疾人而放弃对音乐艺术的追求，她的事迹曾先后入选《世界华人当代名人大典》《中国当代音乐界名人大辞典》《中国文学艺术家名人大辞典》。她说：“我愿与全国所有的词曲作家（者）携起手来，共同进取，让词曲同飞蓝天；愿与全国小朋友、音乐爱好者一起，同歌同舞阳光下。”

（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会石柱分会副会长）

